

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叢書

龔自珍全集

〔清〕龔自珍著
王佩誥校



〔清〕龔自珍著

王佩諍校

龔自珍全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龔自珍全集

I214.92

39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龔自珍全集

〔清〕龔自珍 著

王佩誥 校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1.875 插頁 7 字數 468,000

1999 年 6 月新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0585-5

I·347 精裝定價：33.60 元

己亥九秋重過素浦
時多醒時少也眠詩
統名之曰寐詞

豆蔻芳澤感瓢犀傷心
重題牡丹鏡乞三春
左家士妻

太史公書創在京師說

太史公為書百三十篇成表漢氏威德赫然濟于姬魯及
功至賢士大夫靡不載日序云臧之石以傳之其人創在京
師問何以創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為創在京
師曰宋唐實共必於蒲坂子易求周公於雍岐宋成周必
于河維欲求漢者必于關中矣故創在京師太史公之先
官京師共數十人太史公主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于
京師仕則由石室金錯于京師其四世所師友唐都黃子
田何孔安國壽遂之倫書京師著舊師士太史公亦雖
無創符并書之榮其于京師也根突而原遠而終京師
則是不思王父不思父以不思師友是故創在京師京師
既上繫王父又必自磐石之宗尤古今之歡羽翼天室

龔自珍墨跡一文

日序少蒙受名夏易地理志左馮翔夏陽注云
龍門在其北故太史公是左馮翔夏陽縣人也
則知藝文通鑑易夏誤日也

則知義史通丘易夏誤日化



相見價情長只有鄉野大道王三百年来文物

感奮忘身到亭九友旁書中凡反商烟客先生

梅雨好悽涼點我丹青一扇香裏珍夢裏裏

握收藏配君家賦九行昭示春山美人便面予所蓄有唐

昭示春山美人便面予所蓄有唐

小詞一解題奉

紫若仁兄 仁和龔自珍倚聲

時已角夏五



龔自珍墨跡一詞

前言

鮑正鵠

一百二十多年前，龔自珍怀着难言之恫，在自北京南归途中，感慨而又自負地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

不久之后，政治地位比王通略高、做过二十年小小京官、年方五十的龔自珍就去世了。留在人间的只是三百多篇杂文、六七百首诗詞，然而在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确开创了一种风气，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紀中叶，这种影响已经是可以觉察的了。在鸦片战争之后有人說道：「近数十年来，士大夫誦史鉴，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到了本世紀的二十年代，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思想时，有一段很具体的評論，他說龔自珍「好今文」，「喜为要眇之思」，「文辞諷詭連牴」，「往往引公羊义譏切时政，詆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龔氏之一时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淺薄。」尽管梁启超的批評，褒中尚有微辞，但「与有功焉」正是开风气的好注脚，「若受电然」，也生动地說明了龔氏

思想所产生的震聳发聩的作用。从龔自珍以河汾之道自許，以及上述两种的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龔自珍所开的风气不仅是一般的学术风气，而且还是一种政治风气。如众周知，那时期好慷慨論天下事的士大夫是指那些在鴉片战争前后具有改革思想而发憤图强的知識分子；梁启超所說的新学家是指那些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資產階級改良主义变法运动中的活动家和思想家。虽然这些人沒有建立起、也不可能建立起「房、杜事业」，但在中国近代史中，这些人是思想上的启蒙者和政治上的先行者，他們在革命过程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样看来，龔自珍的厚自期許，虽不无浮夸，而从客观事实上来考察，說龔自珍开创了一种政治风气，倒也不算过分。

既然龔自珍所开創的风气是政治的，和近代中国革命相联系的，那末这种风气一定代表着某种阶级意識，无疑的，在它出現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来自某方面的抗拒。同时，对他的思想和影响的估計也必然会有异同——根据不同的立場观点出发而得到不同的結論。

在变法运动失敗之后，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发展更为蓬勃，一九〇三年反动的老洋务派官僚張之洞在北京写了一首題为学术的詩：「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菱麦，只恨荆榛滿路栽！」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經学讲公羊，文章讲龔定庵，經濟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从写作的时间、内容以及注文最后两句无可奈何的感叹看去，可見他对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傾向的仇視。張之洞虽把經学、文章、經濟（政治思想）分而为三，实质上却是一种思想体系的三方面表現。尤其是就龔自珍而言，龔的理論基础是公羊义，政治上則以王安石的精

神要求变法。因此这首诗一方面可以說是反动派对当时「风气」的总評論，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反动派对开这种「风气」的龔自珍的評論；而「父仇子劫有由来」，簡直是把龔自珍这一类人看作乱阶禍首了。

这种意見出之于象張之洞这样的人原不足怪，然而把龔自珍看作「禍首」的并不止張之洞这班人。有一种类似的結論，甚至比張之洞更激昂，这是出之于章炳麟的。約在一九〇七年左右，章炳麟在說林中，論及近代文风时，說龔自珍「文辞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然佻达无骨体，視晚唐皮、陆且弗逮，以較近世，犹不如唐甄潜书近实。后生信其誑耀，以为巨子，誠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向风。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章炳麟在經学上是古文派，一生竭力排斥公羊学。在他的著作中有不少批評龔自珍經学的議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里从文学的角度来談，却断言由一个人所开的文风，竟将导致民族灭亡的大禍，可見其对龔自珍痛心疾首之甚。章炳麟和張之洞在政治上有本质的不同，議論的出发点也不同，可是都对龔自珍的思想、文风，作出了同样的結論。

一个世紀以来，龔自珍曾經被人这样称誉过，也曾經被人那样詆毀过，可是无论是誉或是毀，都使人們看到一个基本事实，即是在近代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巨大影响。一种思想的出現，是一定历史实践的产物，从而产生的影响，无论是誉或是毀，也是历史实践的反映。正确地评价龔自珍是今天思想史研究者、文学史研究者的責任。这个工作也只有在今天成为可能，因为我們不仅有可能掌握科学

的思想方法，更重要的乃是近代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考察的根据。

二

龔自珍生于一七九二年（清乾隆五七年），卒于一八四一年（清道光二十一年）。他所生活的五十年，正经历了中国封建社会日益没落、解体，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之途的历史阶段。

在龔自珍出世的前夕，以满洲贵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已经显著的暴露了它的内部危机。由于残酷的封建剥削和腐朽的封建统治，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和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尖锐。具体表现为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内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运动。所有这些反抗与起义虽然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矛盾却依然存在，而军事镇压所带来的灾难客观上又成为加深矛盾的新因素。这样，反抗与起义就綿連不断，甚至在统治阶级根本之地，禁卫森严的首都也不例外；由此可见阶级矛盾尖锐的程度和清政府统治的危机之深重了。

这一时期清政府统治的危机，还可以从统治集团的日益腐化中看到。乾隆末年，吏治廢弛，瀆法貪污之风大盛。尤其是统治集团的上层，更是昏庸腐爛，不可救药。这些人大都貌似忠厚，其实是自私、阴險。他们除入股之外，一无所知，然而却好高談程、朱之学，假讲学之名，营私植党。他们在政治上毫无建白，却用老成持重的面具，傾排异己。上层如此，其他的官僚就更抱着「生斯世也，为斯世也」的乡愿哲学，蝇营狗苟，孳孳为利。这些现象虽然是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本质的必然表现，但发展到成

为一种风气，正足以说明其无法维持其统治的严重形势了。

清朝统治的内部危机，客观上给野心勃勃的英国资本主义以可乘之机，从十八世纪末年处心积虑地进行侵略活动，终于掀起了鸦片战争，迫使我国走向半殖民地的道路。

龔自珍生活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浪潮冲击了他，五十年的历史实践教育了他。他的思想就可能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成为新阶段的序幕的标志。

三

龔自珍思想的出现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史发展到新阶段的序幕，是由于他从统治阶级内部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阴暗面和现存制度的不合理，也是由于他敢于大胆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又正符合于社会进程的轨道。

龔自珍出身于一个三世京官的官僚家庭。这种家庭原来是只能产生一些「知車馬服飾，言詞捷給」或是「知作书法、賡詩」的官僚而已，但是农民起义的铁骑刀枪惊醒了年轻而敏感的龔自珍，使他在起义的火光照耀之下，窥见了社会的阴暗面。再加以久居首都，耳目所及而累积的生活经验，使他不能不深刻地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而发生强烈的憎恶。当他还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时，就写了四段激切的明良论，对当时的政治作了严厉的攻击。他首先指斥那些三公六卿以至凡百士大夫都

是一些醉心利祿、諂媚君上、犬馬自為的寡廉鮮耻之徒。他把這些毫無責任感的官僚比之為寄食的寓公，旅進旅象的仆從，伺主人喜怒的狎客。這種議論固然是從維護封建階級利益出發的，可是的確道出了當時官僚們的腐朽的實情。而且龔自珍在分析原因時，也直率地指出他們之所以這樣犬馬自為，是由于專制君主以大馬視臣下的不可避免的結果。這樣，「虽圣如仲尼，才如管夷吾，直如史魚，忠如諸葛亮，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為，而況以本无性情、本无学术之儕輩耶？（明良論四）」指摘官僚的腐敗，本非什麼了不起的見解，但是過去只作為對待個人道德問題提出來。現在卻從產生發展的環境去考察，他的議論也就在相當的程度上觸及到問題的根本。在明良論四中又有這樣一段意思顯豁的比喻：

人有疥癬之疾，則終日抑搔之，其疮痛，則日夜撫摩之，犹有未艾，手欲弗動而不可得。而乃臥之以独木，縛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則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慮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手故也。

清朝封建統治的危机固然不止是「甚痒且甚痛」的疥癬疮痛的蔓延而已，更重要的却是所謂束縛四肢不可以撫摩屈伸的「长绳」，也就是那個「不可破之例」。這「例」，實質就是極端封建專制主義的制度。他認為這樣不合理的「例」應該改變，于是他提出「更法」這一概念，并且警告說：「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

龔自珍對現實社會的暴露與攻擊隨着年齡與經歷的增長擴大而日益徹底尖銳。但是社會經驗告訴他，在當時嚴密的統治下，用明良論那樣直率的口气發議論是不能被允許的。之後，他的政論大都

采取考史、論經、寓言的形式出現。高压的政治空气沒有挫折他鋒芒，而字里行間則更閃爍着挑戰的矛頭，其議論見解也愈來愈精辟中肯。

从留下来的作品看来，他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在写明良論后不久，有了进一步的認識。在著名的平均篇中，他指出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是貧富不均。他說「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則亡愈速，去稍近，治也稍速。千万載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他說：

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阨，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鴻濛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郁于天地之間。郁之久乃必發，為兵燹，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不是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出現过这样「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的大危机，在想象中是无从写出这样怵目惊心的議論来的。

龔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議第九中，把这个社会肯定为所謂「衰世」，并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描繪：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鏘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議。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閭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隴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狙，藪澤无才盜，則非但眇君子也，抑小人甚眇。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宜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

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忧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

这是多么可怕的黑暗时代呵！无是非、无黑白、无善恶、无真伪，一切善恶是非都被混淆，一切聪明才智都被扼杀。这正是一个封建制度行将解体，虚伪的封建道德准则即使百般加强也无法控制社会思想的一幅图画，真如文章结尾所說的：「将萎之华，惨于槁木！」

面对这么一个乡愿式的不可救药的社会，龔自珍甚至否认了它的合法存在。他公然說：

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臥穹廬，衣文綉而不聞德音，不如服纈。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閉宮庭，有清廬閑館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藪。

——乙丙之际箴議第二十五

統治階級当然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龔自珍的憤慨也仅仅是憤慨而已。但其憎惡之深，不啻相鼠之篇，实足以代表人民的愿望，而不仅是一个人的感情。

对統治階級是絕望了，而新生的力量确实已經在逐漸成长，龔自珍在尊隱一文中充滿了对未来的朦朧的期待。在这里他首先把在乙丙之际箴議第九中形容的衰世用另一种結構与形象来描繪：

日之将夕，悲风驟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飲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这时，人才已不生于京师，四野的豪杰也对統治者离心离德，而山中之民却一嘯百吟，團結一致。他預見到一到「灯烛无光，但聞鼾声，夜之漫漫，鷗旦不鳴」之际，「則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濤矣。」

固然，我們不必牽強附會的說龔自珍已經預見到新的农民运动即将到来，可是他怀着热烈的希望，期待一个变的局面的出现，在这里是可以觉察到的。

龔自珍在揭露当时的黑暗政治时，还具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思想。这种思想在乙丙之际箴議第七中已露端倪，到写古史鈎沈論时（三十四岁左右），反满的情绪则更加明显。

古史鈎沈論一痛斥历史上的「圣祖仁宗」都是一些挾才武財富以蹂躪人才的狡黠人物，他們是：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大都积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獮，既夷，……一旦責有气于臣，不亦莫乎。

这段话显然有感于清朝统治者百余年来的高压政策而发的。

在古史鈎沈論四中，粗看似乎是在要求满洲貴族对汉人开放政权。但是开头就说，「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明明白白說他們「天数已尽」。接下去就指出满洲貴族始終对汉族人民抱着猜忌和防范：

祖宗之兵謀，有不尽欲宴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尽欲与宴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欲受宴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宴之議論者矣。

他以为在这种政治歧視之下，汉族人民应该「知所以自位」，「知所以不論議」。「諫而不行則去」，不必「憔悴悲忧」，「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他說：

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乐器而降者矣，有抱国之图籍而降者矣，无籍其道而降者，道不可以籍也。

这是多么充滿了自尊心的民族思想！文章到結束又狠狠地对那些趋附滿洲貴族的汉族士大夫加以訓斥：

若夫其姓寔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闔閭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馬行以求祿，小者丧失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矣。

这种反滿民族思想的出現，应当看作他痛恨黑暗統治、要求政治改革思想的进一步的发展。

四

慷慨論天下事，不止是揭发病痛，必然会同时提出所以疗救之道。这是龔自珍自己也說过的：

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无其力，則探吾之是非，昌昌大言之。

——上大学士书

居下位而无其力的他，从三十岁左右开始，就对农田占有、科举官制、币制税制、西北边防、海疆通商等方面，先后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而其基本精神則归結为他所鼓吹的「改图更法」。从他所提出的具体办法上看，虽然有些思想已經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疇，但更改的性质还是想在現有秩序的基础上寻求新的出路，还是为了緩和社会矛盾，挽救政治上的危机，不是也不可能从消灭封建主义出发来进行根本的改革。然而这些办法或意見对当时的现实而言，都是处于相抵触的对立一面（干祿新书自序中的